

大法化解了我對婆家的怨

【明慧網】

難以解開的怨緣

丈夫家兄弟四個，丈夫排行老三。我結婚後和婆婆住在一起，後來二大姑姐從鄉下搬到城裏也與我們一起住。那時候我女兒剛滿四個月，我們和二姐在一起住了三個多月時，婆婆突然提出讓我們搬出去自己過（還是在一個院兒里），我心里明白：這一定是二姐的主意，想把我與丈夫攆出去。我和丈夫沒跟她們計較，就搬出去單過了。

為了丈夫單位分的豆油，婆婆領着兩個大姑姐、大姑姐夫，小叔子氣勢汹汹來到我家，站在我家門口破口大罵，罵了兩個多小時，我要出去和她們理論，丈夫死死的拽着我不讓我出去，他說：“我求你別出去，要不我給你跪下。”我看着可憐的丈夫，沒有出去，可這口氣真難忍啊！後來，我們搬家了，離開了那個大院。

在那些年一段時間，丈夫經常半夜回家，有一天他半夜回來，我又跟他吵起來了，正好婆婆住在我家，婆婆不去教育自己的兒子，却衝着我來了：“你要是不放心，那你就天天跟着他，他啥也別干了唄！”我說：“媽，你知道歌舞餐館那是啥地方？哪個好人去那兒？不想好好過那就離婚。”婆婆看丈夫不吱聲，說：“離就離！”我心里這個氣啊！我咋遇到這麼一個不講理的婆婆！

婆婆有點錢想要分給幾個兒女，我知道這一定是兩個大姑姐的主意，我和丈夫勸她說：“你身體不好，留着自已用吧，別分了。”婆婆還是執意要分，她說：“我要用錢時，你們四個再平均拿。”婆

婆最後還是聽了兩個大姑姐的話把錢分了。婆婆有病住院，兩個大姑姐都不掏錢，小叔子更是一毛不拔，全都是我家出錢，我心里這個氣啊！怨啊！怨婆婆把錢分了，等有病用錢的時候，咋不平均拿了？怨丈夫給一大家子人買吃買喝，盡花冤枉錢；怨兩個大姑姐自私自利，只顧自己；怨丈夫早出晚歸，天天不着家，不是吃就是喝，再就是玩麻將，想想自己結婚後嫁到他家，沒過上一天好日子，除了生氣就是受氣，我的命咋這麼苦啊，不知前輩子究竟欠了他家多少債。

幸遇大法化解了怨緣

1998年，父親從外地拿回來一本寶書《轉法輪》，父親說：“這是佛家修煉大法，一世就能修成，煉功還能祛病健身。”父親把寶書給了我，我拿回家，迫不及待的看了起來，越看越願意看，越看越想看，不願放下。半輩子的痛苦，在書中我都找到了答案。

師父的法理解開了我的心結，使我放下怨恨，善解這段難以解開的怨緣。我再也沒有了怨恨與痛苦，唯有對師父的無上感恩，感恩師父幫弟子還了生生世世欠下的那無邊的業債，師父把我心里所有的怨恨和痛苦都掏走了，塞進去的是滿滿的感恩與慈悲。

師父讓我做一個好人，處處為別人着想的好人，我听師父的話，事事都按大法真、善、忍的標準來要求自己。婆婆現在歲數大了，各種病都出現了：心臟病、腦血栓，一年要住八次院，每次住院都是我



家拿錢，而且都是我主動拿錢。我不修大法，沒有這麼好的師父指導我修煉，我也做不到這一點的。

親人贊：煉法輪功好

親戚們來看望婆婆，我和丈夫請他們吃飯，姨婆婆在親戚面前夸我孝順、懂事、大氣，不跟哥兄弟計較，不攀不比，在這麼霸道的婆婆面前能這麼百依百順，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，還是有信仰好啊，煉法輪功好啊！婆婆也笑着說：“我這兒媳婦煉法輪功煉傻了，我無論說她啥，她都笑呵呵的，从不跟我頂嘴。”姨婆婆還當眾對這些晚輩們說：“你們今後都要向你大嫂學習。”

我笑了笑說：“我師父叫我做一個好人，與人為善，遇事為他人着想。”我的言行讓常人見證了大法的超常與偉大。我和姨婆、親戚們講大法真相，他們都認可法輪大法好，做了三退（退出黨、團、隊組織）。後來婆婆去世了，公公把我們花的錢都還給了我們。

文/大陸大法弟子◇

麻莲凤在山东省女子监狱遭迫害经历

【明慧网】山东烟台市龙口市法轮功学员麻莲凤女士，于二零零三年十一月被绑架、非法判七年，在山东省女子监狱遭



▲麻莲凤

到残酷迫害。二零二三年九月底被龙口开发区派出所警察开车追赶，造成三轮车侧翻受重伤，她于二零二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含冤离世，终年六十九岁。

以下是麻莲凤自述在山东省女子监狱遭迫害经历（节选）。

烟台市龙口法院非法重判我七年徒刑，我被劫持到山东省女子监狱（位于济南市高新区世纪大道路北 3777 号，在高新区一中往东 500 米）。那一年我正好五十岁。

暴力洗脑 奴役折磨

在山东省女子监狱集训队里，我的血压高压达到 160，低压达到 100，他们依然强制给我洗脑、酷刑“转化”，半夜两点才让睡觉，两个半夜后，他们开始强迫我吃药，不吃就不让睡觉。我被迫吃药后他们继续迫害我，二十四小时不让睡觉，困了就让面朝墙站着，上厕所得报告，不报告不让去厕所、不让洗漱。洗漱时间只给三分钟，有时故意刁难我，当我刚放下脸盆准备洗漱时，值岗的罪犯袁玉芬（烟台人）就喊：到点了。她还强迫我爬窗台上擦玻璃，我头晕得厉害，血压更高了。她们还让我写邪恶的五书，我说不会写，犹大高芸丽、邢丽琴（烟台）就把写好的邪恶五书拿来让我签字，我不签，僵持了两天两夜。罪犯袁玉芬带着四、五个人进来，把我按在靠墙的马扎上坐下，用监室吃饭的桌子挤住我的身子，袁玉芬拽着我的头发按在墙上，把着我的手在提前写好的邪恶五书上摁了手印。之后强迫我看诬蔑师尊、诬蔑大法的录像，并让我写所谓感想。

二零零四年七月底，我声明被强制签字的五书作废，坚修大法到

底，恶警加重了迫害我的力度，之后我被转入被称为“魔鬼监区”的四监区奴役迫害。被强迫没白没黑的加工服装。我的手指被电锤打的骨头都变形了，也不让休息。

遭关禁闭迫害

二零零六年七月下旬，恶警队长杜鹃、教导员徐玉美假借我炼功为名，把我关进了禁闭室。济南的夏天非常闷热，我被关在密不透风、狭小的禁闭室里，备受折磨。杀人犯杨桂梅把我拖倒在地，提着一条腿漫骂了一个多小时，并和其他犯人轮流在我耳边放诬蔑大法、诬蔑师尊的录音，为了禁止我盘腿坐着，每天都有人在我两腿中间踏上一只脚，她们让我伸直腿，或者让我站着，就是不许盘腿坐着，她们还往胶皮铺上倒水，使我无法坐，杨桂梅还往我脸上泼水，用尽一切办法折磨我。她们一天两次给绝食抗议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灌食，我就喊“法轮大法好”。在这密不透气的小屋里，有法轮功学员中暑了，狱方才把屋子上方的小窗打开。我一有时机就高喊：“法轮大法好！”极大的震慑了恶人，恶警指使杀人犯杨桂梅毒打我，杨桂梅拿着蒲扇（夏天用的芭蕉扇）狠打我的头、脸，我的嘴肿的老高，蒲扇上沾了鲜血，她用水把扇子上的血迹冲洗干净，以掩盖恶行。犯人袁玉芬用脚踢我，故意刁难我。

在禁闭室被关了十三天后，我被劫持到四监区一间与外界隔绝的小房里近五个月，期间他们不让我与任何人接触，最初的两天从早上六点到半夜两点，之后就是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一点，一直被强迫坐在小马扎上，不许活动。慢慢的，我的左脚失去了知觉，脚上肌肉萎缩，走路很不方便，左胳膊也抬不起来，左肩没有知觉。

到了十月份，恶警徐玉美担心我有危险她们要担责任，就在犯人出工后让我到大厅走动，直到现在的左脚依然严重变形，一到冬天

中共强迫去做奴工示意图：



脚就发凉。

被强制注射不明药物

有一次血压很高，我不能出工，教导员刘玲（四十多岁）带人来把我抬到了医院门口，医院不收，我被放在院子里晒。后又把我抬回了监室。刘玲魔性大发，把我的衣服扒光，把我的短裤扔到垃圾箱，一把揪下我的乳罩，撕烂，又要扒我的内裤，我紧紧护着，她才有得逞。

还有一次，警察马海荣让我跟她出工，走到楼下，呼啦上来五、六个犯人，抬头、抬脚、拽胳膊、拽衣服，把我抬得起空，有人拿毛巾捂住我的嘴，怕我喊“法轮大法好”。她们把我抬到一个单间，扔到床上，我从床上滚下来坐到地上，院长和医院队长要给我量血压，我不肯，她们说：不给你打针，也不给你吃药。我仍然拒绝。院长看着虚弱的我说：你能自己走回去你就走吧。我从地上慢慢站起来，跟着马海荣回到了监室。

二零零八年，一天早上，监狱医院院长领着狱医强行给我打了一针不明药物，之后四监区来人，把我绑架到了医院，黑心狱医往我嘴里野蛮塞药，被我吐出来，她说：医院有的是药。四、五个人摁着我的手和脚，把我绑在床上，强行挂上吊瓶，我拼命反抗，高喊：“法轮大法好”，折腾了半天，针没打完就回来了。

我的遭遇只是中国千万个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缩影，还有更多鲜为人知的迫害内幕，由于中共邪党的封锁、掩盖，还没被揭露出来。